

第二章 毛時期民族主義文化角色變遷與發展

自中國有歷史以來，面對國際關係問題，面對與他國、他族人士的交流議題時，多以文化優越的角度出發，以中國的「優良傳統文化」作為其與外國勢力打交道的依據，這是一種文化主義的體現，而且，這樣一種以文化為本位的民族主義心態，實際上是根基於既想模仿西方先進文明，又想保護中國文化不受侵擾的看似矛盾的見解；¹而當時間移至清末民初、五四運動之後，則形式稍有不同，有智之士們紛紛檢討過往的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甚至要求全盤拋棄中國的傳統，以面對來自西方思潮的衝擊。

當時，共產黨人士與毛澤東，亦受到了自五四運動而來的檢討「文化主義」的影響；而經過了時間的流逝，中共也更替了幾位領導人後，毛澤東逐漸嶄露頭角。其實，毛澤東為了掌握中共內部實質的領導權，或說是為了構築出他理想的中國圖像，從年輕時期開始，他就著重從中國的獨特性出發，以身體力行、或稱之為實踐的方式，力求發展出一系列能夠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與政策宣言。待其逐漸掌控並且穩固自身的權力之後，即陸續將這些想法與實踐方式付諸實行。

不過，毛澤東強調從中國的獨特性出發，是否就代表他要求全盤的接受「傳統文化」，則有很大的議論空間。他在一九一七年與其師黎錦熙的信中，就強調中國之所以會敗壞不堪，就是因為上至領導，下至一般平民大眾，都有著思想太陳舊與道德太敗壞的問題，他說：

「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

¹ 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台北：揚智，1997)，頁79~80。另，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有與不同民族與國家接觸的紀錄，漢朝時有張騫、班固通西域以及甘英甚至到大秦(羅馬帝國)參訪；隋、唐朝則有與日本、中亞等國的交流；宋、元兩朝也有來自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商賈人士前來中國；時至明清，影響最深的乃是耶穌會之傳教士，包括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人。請參閱，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改變中國**(台北：時報，2004)。

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唯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幸則與本源略近，不幸則背道而馳…近頃閱書報，將中外事態略為比較，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吳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²

毛澤東的論述，對於傳統儒家道德文化，實多所怨言。他認為中國的弊病，必須要從人心、從人的思想文化改變起，有個大徹大悟的更新，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其他的作為，都只是配套方式，而不該是中心主幹。這代表著青年毛澤東一種理想的性格，顯現出其一種憂國憂民的心態，但在當時，他並無多餘之能力對現狀做有效的改變。這種大徹大悟、大規模的人心改造過程，一直要到文革爆發，才似乎真正可見。

此外，毛澤東在黨內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從非主流到主流，他強調的是一種「實踐」的力量，這樣的邏輯思考，亦從早期就深入他的內心之中。他曾經提出，在學術研究領域，要徹底研究，不受傳說迷信的束縛，要找尋什麼是所謂的真理；³同時，在當時社會一股留學風潮底下，他提出他之所以要留在中國的理由，包括看翻譯本吸收知識較快、要對東方文明或中國文明做大要之研究，以及最重要的，要對中國做實地的調查及研究。⁴在此，我們除了看到毛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也看到他一心想徹底了解「中國文化」的心態，而這樣一種心態，也影響了日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建構與呈現。

² 毛澤東，「動天下之心為大本大源—致黎錦熙」，載於姜義華編，**毛澤東著作選**（台北：商務，1994），頁 8~9。另，本篇篇名為編者自行加入，而非毛澤東本人所定。

³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提到：「…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看什麼是真理。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至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請參閱姜義華編，**毛澤東著作選**，頁 21。

⁴ 請參閱姜義華編，前揭書，頁 28~33。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與王明爭奪領導權的過程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用以打破過往中共黨人太過依賴所謂「傳統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建政後，又從「一邊倒」轉向自立自強、獨立自主的模式，甚至，毛的作為帶有更為烏托邦的概念，中國的落後經濟與社會現實，不再是發展的阻礙，反而變成快速進入社會主義乃至於共產主義的有利條件；⁵最終，經歷了各形各色的政治、社會運動與政策實踐，在毛統治晚期，中國進行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使整個國內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都遭受到巨大的影響與衝擊。

基本上，不論毛澤東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是「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他在思考問題、做決策的時候，通常都帶有相當濃厚的實踐性格，他會將理論運用至實際狀況，但也因此可能導致其理論產生矛盾的現象，甚至與馬克思主義產生衝突或抵觸。⁶但是，毛澤東絕不只是個實用主義者，很多時候，例如文革時期，他的理想主義性格又顯露無遺；此外，撇開他是否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議，若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或角度出發，用以看待毛澤東的行事風格，則又可從中了解毛的理論邏輯與思考模式。

二戰結束之後，中國正處於一個百廢待興的狀況之中，人民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的侵略與欺負，早已喪失對其的好感，加上當時與西方親近的國民黨官僚日益腐敗，更使得資本主義要想在中國深根茁壯成為一件極其困難之事；毛澤東看準這樣的現實，已早先從黨內的鬥爭開始，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適時的配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創造出屬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架構，並藉此獲得整個黨的支持與擁護，甚至進一步贏得人心，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其中當然也包含著毛個人的克里斯馬(chrisma)，也就是領袖魅力的優勢，

⁵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216。

⁶ 溫洽溢，「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亞季刊**，第 28 卷第 2 期(1997)，頁 176~177。

以此吸引著更多的人民願意服從、願意認可他的論述，使民眾都成為民族主義運動下的參與者與一份子。⁷毛的民族主義心態，根基於中國/西方長期以來的歧異與不同，與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榨與制約，因此，當他巧妙的運用人民的這種敵視西方的心理狀態時，很大程度的已經隱藏了他日後的成功。

本章試圖從毛澤東時期所製造的一些民族主義式的理論與政策之中，討論「民族主義」論述的策略、內容以及變遷過程，與中國文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在毛的思維之中，民族或人民佔有很大的重要性，而基本上，人民或民族必須不斷的新生，才能參與整個社會的不斷流動與成長的過程，在同一時間內，民族或人民也經由這樣的過程不斷的證成自身的存在。⁸毛澤東了解人民大眾的訴求，因此鋪陳出一系列激發民族信心的論述與政策。本章將從中了解毛澤東的民族主義論述動態建構過程的重要性，並分析這些概念形成的原因、過程與結果，以及對於中共內部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第一節 本土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建構

當西風東漸，19世紀源自歐陸的馬列主義傳至20世紀初的俄國後，俄共領導人列寧有鑒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與侷限性，逐漸開創出一條屬於俄國的「俄式馬克思主義」，或可稱之為馬列主義的俄國化。列寧強調菁英式的政黨，並且認為要有職業革命家的加入與思想的創建，才能夠讓革命獲得重要的成功；列寧與俄國共黨領導人的作為，對於毛澤東掌權之後的所作所為，有相當程度的啟發作用。

由前述我們可以得知，毛澤東在早期階段，是希望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大規模的改造，以期能夠導正中國的前途。不過，他依舊從許多中國的文化中找尋有效

⁷ 關於民族主義運動中，領袖之具備克里斯馬(charisma)優勢的解釋與範例，可參閱，帕爾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著，楊曦等譯，*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一種衍生的話語*(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第三章、第四章。

⁸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8~19。

之處，企求從此中配以馬列主義，發展出一套符合其理想中國該走的理論。當然，有時候他只是借用了某個典故、某個成語，甚至完全轉化這些傳統原本所代表的意義，但也就是因為這種手法，讓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以較輕鬆的讓人民吸收，例如他講愚公移山的故事，強調人定勝天與人的主體能動性的重要性；「看菜吃飯，量體裁衣」來強調具體的實踐與分析，⁹這種通俗的語言，深入平民大眾的思想之中，同時也使毛的論述更能夠讓人民了解。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概念，首次是由毛澤東在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提出來的，他在會議中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內文提到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看法，摘錄如下：¹⁰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急待了解並急需解決的問題。」

很明顯的，毛澤東在全會上所強調的，就是如何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獨特性相結合，並如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理論或論述。更重要的，毛不喜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將重心放在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與方法之上，以此對中國的具體情況與現象進行研究與發展出獨特的解決之道；¹¹亦

⁹ 江傳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理論探索*，第2期(2007)，頁29。

¹⁰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載於**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499~500。

¹¹ 何繼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1。

即，毛澤東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單是一種靜態的理論，更應該配合各國實際狀況，動態的發展出不同的、符合當地之架構與理論的鋪陳。1941年，毛澤東又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宣示其想法：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¹²

這樣一種「理論」與「實際」結合的例子，在馬克思早期的論述中就有類似的提法，這其中就隱藏了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以及在此過程中實踐的第一性。¹³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有這樣的意味存在，他強調馬列主義中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結合的重要性，但並不盲從馬列主義。

基本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建構，除了代表著本土/外來的區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區分出「我/他」的歧異，以最適合中國發展的做法與論述，進一步取代外來的或是不合中國國情的論點與政策。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受到從俄國返國的正宗「俄式馬克思主義」傳人王明的挑戰。王明以其受到共產國際甚至史達林在其背後的撐腰，對毛澤東形成強有力的威脅。王明秉持的是共產國際與蘇聯共產黨的準則，以蘇聯與共產國際的代言人自居；毛的思想淵源，則從自由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到孔孟儒家、宋明理學與近代的康有為、梁啟超、孫文、陳獨秀和李大釗等等綜合而成，實是相當複雜與多元的。¹⁴此外，從早期開始，毛就注意到中國農民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與地位，這是與傳統馬列主義

¹²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載於**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753~754。

¹³ 沃馬克(Brantly Womack)著，霍偉岸、劉晨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 1917~1935**(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232。

¹⁴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頁126。

不符的論述；並且，毛澤東則強調實際考察，反對教條式或經典式的論述，¹⁵都在顯示出他不願意照搬「俄式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

當毛澤東逐步建立其自身的馬克思主義論述時，基本上即是圍繞著「使馬克思主義成為適合中國發展與國情，並能夠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的相關問題。不過，毛亦避免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項工作，上綱到將中共賴以維生的「馬克思主義」完全破壞，以求得中共的延續與持續發展，並維持中共的正當性。¹⁶另一方面，毛澤東的這項努力，亦不是從表面上看到的只是為了與國際派進行領導權的鬥爭，更重要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從西方的源頭，到蘇俄的轉變，最後成為中共的資產，甚可說是成為「中國文化」獨特性的一部分。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與發展，也可看出毛澤東從文化立場出發，對民眾進行洗腦、改造所得到的效果。簡單的說，任何一種「某某化」，就是要從符合「某某」的特點出發，得到適合「某某」或近似於「某某」的結果。毛將原本從歐陸發源來的馬克思主義論述與觀點，轉變成為屬於中國特有的論述與觀點；一方面，讓從清末以來受盡列強屈辱的中國人民，可以有另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選擇，另一方面，這種意識形態的轉變，也隱含著民族主義的論調與機制，使人民對共產黨產生某種程度的歸屬與認同，不同於當時的國民黨，予人的觀點就是向歐美大國靠攏，甚至連蘇聯都公開支持國民政府，讓國民黨成為列強的保護品，一定程度使人民對其產生厭惡感或較差的觀感；反之，中共利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調，雖然也是一套來自於西方的思想，但中共適時的轉變其內容，讓「馬克思主義」變得能較輕易的被人民了解，並使人們有另一種心靈上甚至實

¹⁵ 請參閱，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於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11~22；另可參閱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於毛澤東著作選讀，頁48~58。

¹⁶ 賴皆興，*中共意識形態發展中的後殖民意涵：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三個代表」*（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2002），頁41。

際上的寄託，以傳統文化、中國國情做為準則，配合已經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讓人們更容易對其產生認同，以致於更能夠接受中共的治理與規範。

再者，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當程度也展現出布迪厄「文化再生產」的手法。延安時期是毛澤東發展其論述的重要階段，他透過種種的做法，包括寫日記、小廣播，還有時位於延安的黨校支援，將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子與民眾，進行一場既能行諸於文字，又能表現於無形的教導過程；當延安整風運動結束之後，毛的這一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內涵，已烙印在廣大民眾的身心之中，毛將各式各樣的人轉變成為「新人」，一個臣屬於中國共產黨的「新人」，也成為臣屬於毛澤東的「新人」。

基本上，民族主義在這段期間中所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帶給廣大中國工農階級一個嶄新的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中國能夠產生一套屬於自己本身的「論述」或「策略」，進而能夠利用這套工具擺脫或至少減少外國列強對中國長期以來的宰制與掠奪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單單只是毛澤東用來與國際派、國民黨鬥爭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他者所不能提供的認同/同意的感知或意義。也就是這樣，「中國傳統」或「傳統文化」被毛澤東有效的運用，將之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做有機的結合；這或許是因為毛澤東所受過的教育使然，又或者是他曾交往過的人士、朋友使然，¹⁷傳統文化或所謂的「本土」其實在其內心中一直都深深的影響著他，左右著他對中共乃至於整個中國的走向與發展之態度。

¹⁷ 毛澤東的教育，經歷過舊時代的學制與新式學堂的洗禮。在舊學制時代，他從中學習到了包括四書五經等中國傳統經典；爾後，他陸續進入新式學堂以及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就讀。在他年輕的時候，包括揚昌濟等人對他的教學指導，使毛從中深刻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充滿現代性思考的新式文化，兩者兼容並蓄。這些概念也影響到他早期的著作與論述，包括「體育之研究」、「『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民眾的大聯合」等等；請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一、二、三、四章；沃馬克(Brantly Womack)著，霍偉岸、劉晨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 1917~1935**，頁 3~36。譚若思(Ross Terrill)著，**毛澤東傳**（台北：博雅書屋，2007），第二章。

甚至，在 1945 年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上，中共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¹⁸文中明確表明要使中國革命獲得成功，必須依靠的是結合中國國情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毛澤東思想」，唯有此依據才能帶給中國未來與希望。¹⁹基本上，到了這個時間點，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述已經被黨內許多人上捧成為「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發展與成長的重要依據。很明顯的，毛澤東這種民族主義式的政治策略，有效的搭配了強調中國本土與傳統的論述，使其在中共黨內成為了牢不可破的「聖旨」，同時也為中共將來的走向與統治提供了一套準則與圭臬。

其實，綜合以上，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毛澤東認為這樣一套並非發源自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必須能夠與中國社會、與各項中國現實環境配合，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都必須要經過有效的修正，才能在中國內部順利的發展與實踐；此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蘊含了「理論與實踐統一」這樣的概念，²⁰毛從江西時期就一再的強調研究與調查的重要性，他認為不論是哪一種理論或論述，都一定要能夠有效的實踐與實行，才能夠實現原本所希望的結果，或才能夠證明此項理論或政策是正確的。

不過，很弔詭的一點在於，毛澤東雖然試圖跳脫出中國自清末以來所受到的西方制約，但是，其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際上也是一種來自西方

¹⁸ 事實上，在 1938 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後，毛澤東成為中共頭號人物，對其的讚頌亦越來越多，包括張如心、艾思奇、陳伯達等人都是各中翹楚，張如心更是首次提出「毛澤東主義」的論述；爾後包括王稼祥也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內涵，劉少奇更是在日後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結合馬列理論與中共實際的重要產物之概念；之後在六屆七中全會上，中共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白點出中共歷史發展以來的各項議題總結，並對國際派做出了嚴厲的批判，在中共七大上更接受以毛澤東思想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與行動方針，毛澤東從此刻起成為中共無可替代的實質領袖，而「毛澤東思想」亦成為自馬列主義以降，甚至實質上與意義上超越馬列主義的重要參考與論證依據。請參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第十五章；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頁 377~400；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 197~209。

¹⁹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頁 201~202。

²⁰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75~77。

的思想，在這一點上，雖然他努力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做結合的工作，他也確實做出了一些成效，但很明顯的，當他做任何的政策、任何的論述時，多數時間他仍都會強調這是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來，造成一種毛澤東似乎未能完全擺脫西方影響的面貌，這點問題確實也影響著日後毛在治理中國所持續發展的論述與政策。

當然，毛利用多重的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轉變成為屬於中國的「中國式馬列主義」，並進一步透過各種形式的方式手法，傳導入人民大眾的身心之中，相對於國民黨來說，是很成功的一種做法；很重要的，毛澤東是從最貼近人民生活的文化立場出發，並且有效的在延安時期透過教學傳導的功用，使他的論述與概念更能夠貼近與深入一般大眾的心理層面，使得民眾自覺或不自覺的對中共產生認同，對中共日後的發展，乃至於統治整個中國，都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論述，之所以可以獲得成功，在於毛澤東將這樣一套論述，有效的轉化成為一種當代的「新傳統」或「新文化」。在當時這樣一種對西方勢力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之下，毛的論述有效的告訴平民大眾，中國還是存在著「好的」、「優良的」社會文化，而這就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轉化而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也就是「毛澤東思想」。雖然一般平民大眾很難去了解「馬克思」、「列寧」或「毛澤東思想」的真諦，或可說連毛澤東本人可能都無法說出所謂的馬列毛思想的「真正意涵」，但是他成功的塑造出一套強調「民族」、強化民眾「認同感」的思維，配以簡單的口語，讓人民可以輕易的接納之，這也是毛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因此讓毛成功的獲得統領中國的實權與實位。

亦即，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型塑成代表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或是

新的守則，從底層的人民內心思維切入，打破國際派照搬的「俄式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以及代表資本主義的國民黨政府，以一種全新的、看似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的「中國式馬列主義」打動人民的心，獲得多數人的贊同，這是他不同於國際派，也不同于國民黨政府而能夠獲勝的重要因素。

第二節 渾沌與不明：建政至文革前

中共在與國民黨的長期內戰之後，終於獲得了勝利，取得了統治中國大陸的權力。²¹一定程度上，這代表了毛澤東所標誌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立場，戰勝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同時，亦顯現出毛澤東掌握民心的獨到之處。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雖融合了某些中國傳統與馬克思列寧的思想，不過也不能因此就認定這種新型的文化即為代表中國的新文化，或是中國文化轉型的成功，²²也可以說，毛澤東仍無時無刻的試圖建構出所謂「真正理想」的中國，因此，建政之後的毛澤東與中共仍舊處心積慮的試圖找出最適合中國發展的「文化」。

基本上，從建政至八大，毛澤東一方面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始終想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他又必須借重蘇聯的幫助與經驗，讓中國得以進行發展。毛使用的民族主義策略是其能夠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來，他藉此擺除西方資本主義的侵蝕，另一方面，也使其可以用他想要的方式進行治理與改革的工作。但是，由於中國當時本身的殘破與落後，使毛仍必須借助蘇聯的生產模式與經驗，也因此，造成一種充滿著矛盾的、稍似違背民族主義的情況及立場產生。這樣的過程，使得中共在建政初期的發展，一開始就兼含著「蘇聯經驗」與「中共經驗」這兩種不同的內涵。

²¹ 毛澤東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致詞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實是「中國人」的勝利，「中華民族」也藉此重新站起來了。在這段論述中，毛澤東將中國至當時一百多年的歷史中，所遭受到的欺壓歸諸於帝國主義與國內的反動派，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打倒了來自國內外的壓迫者所獲得的勝利。請參閱，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7。

²² 周熙明、李文堂主編，**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使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74~75。

當時，中共秉持的理論概念是「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並不一昧要求消除所有的資本主義，而只是先消除地主以及官僚資產階級。²³這是為了維持社會大部的穩定，避免造成太多的動盪所做出的權宜之計。此外，雖然中共與毛澤東，是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側重中國國情與文化贏取人民的信任，但在建政後，中共政權與毛開始對傳統文化與知識界進行一系列的改造與挑選。之所以會有如此的情況產生，乃是因為當時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是稱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情況，可說是隱藏著資本主義的種子，亦即，雖然毛澤東與中共都稱其為馬列的信徒，但長期以來，為了暫時維持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實際上仍需依靠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運作模式進行協助。結合上段，在「蘇聯經驗」與「中共經驗」之外，實際上更包含了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革命經驗，也因此，中共在 50 年代初期的發展，可說是兼容並蓄，一口氣包含了至少三種的革命文化與經驗。

由於資本主義的因子仍舊存在，社會上陸續出現許多不良的景況，資本主義社會所擁有的弊病也逐漸顯露，這是毛與中共領導人們所不樂見的。因此，毛開始針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弊病，尤其是「封建文化」進行整理與揚棄的工作，試圖真正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以求中國社會的走向能夠徹底擺脫舊時的窠臼，也可以說，毛澤東與中共對傳統文化是進行一種「批判性的繼承」工作，將傳統中的「普遍原理或通則」納入中共新文化的內容之中。²⁴爾後，毛以及中共開始宣稱中國需要重新出發，逐步的從各項政策中將可能的錯誤進行修改。與此同時，中共甚至藉由所謂的「紅色經典」的普遍化，將中共的論述與政策藉由戲劇、詩歌等方式傳送給人民大眾，並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²⁵

²³ 請參閱，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 623~670。

²⁴ 辛文斌，*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文化現代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頁 234~244。

²⁵ 張裕亮，「從紅色經典到愛國主義商品」，*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7~11。

在這裡，必須再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涵。基本上，毛的這項主張就是凡事從中國出發，由本土出發。從兩個方面可以簡單解釋這項概念，一是將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原本的傳統文化，使其變成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另一則為一種動態的過程，隨著時空環境的不同，它所擁有的詮釋意義與概念亦會隨之變遷。可以這麼說，兩種概念都包含在毛以及中共的行事邏輯之中，互相掩護，並行不悖。最重要的，領導階層能夠利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論述或稱之為工具，對內遂行治理之實，對外又能宣稱中國是遵照馬克思列寧一脈相傳而來的理論制度進行建設的。

在當時，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為準則，中共實施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政策，其中相當重要的，是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有計畫、有目的的整肅與檢討。舉例來說，從中共建政之後，就陸續發動一連串的行動，尤其是對知識份子進行改造工作，包括對電影「武訓傳」的大肆批評、反胡風、批判俞平伯與胡適等事件，²⁶這些整肅事件與改造工作的發生，是為了掃除中共領導階層所認為的「中國封建遺毒」，以期能早日向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社會邁進。在整理舊文化的同時，中共也同步進行「新文化」的推動，包括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並且進行學制的改造、設立更多的新式學校，更重要的是，中共設立了中科院以及國家科委等機構，²⁷希冀藉此改造中國落後的科技文化，重建民族的自信心。

從「舊」到「新」，實際上是毛澤東與中共為了確保中國的發展能夠按照其

²⁶ 批判電影「武訓傳」，是在1951年所展開的。基本上一般人與電影編劇者只是強調武訓在艱苦的環境下進行辦學的工作，是種刻苦耐勞、甚至是為人民服務的表現；但中共與毛澤東看到的是電影中，武訓向資產階級討飯、卑躬屈膝的畫面，毛對此不多加評論武訓的為人，但對於後人所撰寫的有關武訓的事蹟與相關的電影，則進行一系列有計畫的調查與研究，最後，甚至還展開了對個人的檢查行為，揪出許多大小武訓，迫其進行改造與公開批評，而這些人又多為知識份子。請參閱，冷溶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和事件述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92~100；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頁662~664。

²⁷ 蔣積偉，「建國以來中共文化政策評述（1949-1976）」，**黨史研究與教學**，第1期（2007），頁52~53。

預期步調前進，並穩固中共的統治地位所交織而成的一個動態且互動之現象。探究什麼是舊，什麼是新；或著什麼是傳統，什麼是新文化，其實是民族國家相當重要的且必須面對的課題。在中國內部，長久以來包含著相當多的少數民族，因此，如何打破「種族」的藩籬，將種族提升成為單一的「民族」或中華民族，是國家領導者的重要工作。

基本上，中國長期以來都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優越自尊的象徵，外族或外國人只要接受這套儒家儀俗，大多都能夠獲得認同。²⁸但同樣的，這樣的文化優越感亦造成了中國長期以來對西方或其他國度文明的輕視與忽略，更有甚者，形成一種民族優越論，這可由「中國」這樣一個名稱略知一二。²⁹到了近代，中國接受到來自西方列強的震撼，「傳統」的「中國中心論」也隨之轉變成「民族國家論」，這種現象不一定就是政權領導者的意見，有時也包含了從人民大眾而來所綜合而成的輿論。

爾後，經過國民政府、北洋政府時期一直到抗戰、國共內戰至中共建政，中國國家內部對於外國勢力的介入都有不同的看法與對應方式。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化不斷轉化的過程，很重要的，這些轉變也告訴我們傳統不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不變的陳跡，而是當代人活生生的創造；那些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遠的傳統，其實只有很短暫的歷史。³⁰國家的政策、民間的輿論實際上都影響了「文化」或「傳統」的製造與流行。

²⁸ 儒家看待夷狄，自古以來多以「和夷」做為民族觀的概念，例如「撫四夷」、「不忘遠」、「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但也一定程度形成「華夏中心」這樣一種自我中心式的偏見。其他如道家的「自然」民族觀、墨家的「兼愛」民族觀，法家的「攘夷」民族觀，也是各門各派所分別發展出來的不同之觀念。請參閱，曾文芳，「先秦諸子民族觀的多元與兼融」，**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2007)，頁166~170。

²⁹ 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1998)，頁135~137。

³⁰ 霍布斯鮑姆(E. Hobsbawm)、蘭格(Terence Ranger)編，顧杭、龐冠群譯，**傳統的發明**(上海：譯林出版社，2004)，第一章。

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出發，這段期間中共的主要文化建構工作，就是打破西方的資產階級思想窠臼，讓中國社會能夠順利的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之中。也因此，中共力求對於知識份子思想的改造，批評封建式的傳統美德、受過資產階級薰陶的知識份子等事件層出不窮。從文化立場來看，中共為了要製造不同於以往的文化內容，以便於將馬列毛思想刻意的進入人民的生活之中，所以廣為利用包括學校教育、傳播媒體等力量，從事思想方面的教學與散佈，以求中國社會能夠更貼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想，並且力求中共統治的穩固。

此外，在 1953 年時，毛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將原本循序漸進的政策執行模式，改化成類似於空想的革命理論，很明顯的，這已經跳脫出他原本所秉持的「實事求是」、力求「實踐」的做法，反而將中國的落後視為跳入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絕對優勢，甚至更進一步將意識形態統一化，限制人民大眾的思想與作為，使中國進入了另一階段的狀況。³¹1957 年之後，毛澤東的立場更加轉變，一是由於蘇聯原領導人史達林的逝世，蘇共對其進行死後的批鬥，讓毛一定程度的對蘇聯的觀感改變；另外，由於想要快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來的三面紅旗運動，又使得中共社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挫敗。由於經濟上與建設上的挫敗，牽動著領導階層地位的穩固性，因此，從階級鬥爭擴大形成的 59 年反右傾運動，對文化界、知識界的鬥爭與迫害，是毛為了在文化領導與意識形態上繼續保有論述與建構霸權的強勢做法。

亦即，雖然從延安整風以來，尤其是經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與洗禮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與文化逐漸傾向統一與單一性，但在實際面上，相關的知識份子仍保有其自身的獨立性，他們在「雙百方針」中大放厥詞，³²對時政提出

³¹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中國研究導論《上輯》**（台北：陸委會，2007），頁 261~263。

³² 「雙百方針」，1956 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提出的在藝術上「百花齊放」，

針砭，正巧碰觸到毛澤東的痛處，也因此引發之後的反右運動。這些知識份子多數仍保有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風骨，雖然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接受共產黨的統治，但是當社會出現問題之後，知識份子仍會顯現出他們的「職業病」，對政府當局提出質疑。

一般人民則有不同於知識份子的想法。他們是真正嚮往共產黨所提出的社會願景，並期盼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可以帶領他們進入更好的未來；也因此，當毛提出了全民大煉鋼、超英趕美等對於知識份子來說是誇大不實的口號，相對的，對地方上的人民而言，仍是有一定的吸引力，也因此一昧的擁護中央政策，絲毫不敢有所怠慢。這是毛利用了民族主義的優勢，以中國人並不輸給外國人這種基調刺激一般老百姓，妄想以此快速超過資本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從這也看出一般民眾的愚昧，與統治階級的躁進，剛好成為相輔相成的工具。

毛在這段期間已經隱藏起支撐他意識形態基準的「實踐性」，取而代之或起較大作用力的是「理想性」。他認為，即使一個社會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或甚至是共產主義，仍會充滿著各式不同的矛盾與衝突，這與馬克思、列寧的論調都有很大的不同，³³亦即，又是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表現。也因此，他認為要加強對人民大眾的控制，加強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反右之後，一系列不合實際、充滿「理想性」的政策陸續出台，這是毛認為「一窮二白」的中國人民

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政策，並邀集黨外民主人士一同進行討論，但在日後卻引發了反右鬥爭；請參閱李谷城編，**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頁 526~527。另可參閱，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 54~55。關於反右與對知識份子的批判，請參閱，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台北：聯經，2001)，第一篇；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台北，時報，2004)。

³³ 馬克思認為，當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後，階級意識將會消失，剝削狀況也會消失，因此，矛盾也自然而然會消失；但毛澤東則認為，不論在各種型態的社會之中，即使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中仍會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因此革命活動無法停歇，必須長久永續的進行下去。請參閱，史塔爾(John Bryan Starr)著，王晴波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插圖本)**(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78~101；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2003)，頁 85~86。

能夠超英趕美的最有利之條件。³⁴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會經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一系列階段，達到最終的理想；但毛已跳脫出這種思維方式，他認為只要調動人民的生產力，激發人民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是有機會也有可能不必經過成熟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就達到共產主義的天堂。

基本上，毛的各項論述與作為，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扣著其所「認為」或「掌握」的民族意識而來。民族意識，是民族社會的一種群體意識，是各成員對民族的各項特徵、傳統與發展、生存現實及與其他民族交往等等現象的認知。³⁵而若能夠有著適度的民族意識，則可團結民族、使民族確立自信，甚至對民族的發展起到有效的作用。在當時，中國社會處在一種兼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混雜現象，社會到底要向左還是右，有著很多的紛爭與歧見；毛為了使中國早一步進入理想世界，遂大肆以「人定勝天」等類似論調來鼓動人民的「積極性」，宣稱中國人民不會輸給美英等西方霸權國家。其實，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從批鬥電影「武訓傳」、反胡風胡適、一直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乃至於反右，毛似乎是刻意打倒代表封建思維的「傳統」，但當他要往理想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的同時，他又必須借重傳統文化中的「人定勝天」、「中國」等概念，也可以這麼說，他是在塑造一種屬於當時社會最佳的「新文化」，揉合了傳統與現實，並配合民族主義情緒與意識，使他的想法與政策能夠進一步落實。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話語建構依據，就是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這一方面充斥著民族主義的論調，強調中國文化與傳統的優越，另一方面又帶給民眾信心，使人民打從心底認同中共的論述與政策。但到了建政之後至文革前的這段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卻充滿著不同或是嶄新的意涵。一方面為

³⁴ 「一窮二白」，「窮」是指貧窮，「白」指的是文化科技落後，毛用這項語言文字激勵與鼓舞當時的中國人民，在落後的條件下進行發展的工作。請參閱，李谷城編，**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頁15。

³⁵ 熊坤新、嚴慶，「民族問題中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情緒」，**廣西民族研究**，第3期(2005)，頁25。

了掃除過往的遺毒，中共開始有計畫的有目的的消除對其統治不利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為了快速的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必須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以民族主義式的動員與論述方式，意圖達成其預設目標。當然，這種民族主義論述的建構，還要扣著一個課題，那就是中共試圖創造出「新文化」，或是「新傳統」，藉以打破舊時代的制約，使中國能夠真正的站起來，真正的成為國際世界所不容小覷的一員。這種民族主義式話語論述所帶來的結果，使中國進入了一段時間的陣痛期，也為中共內部派系爭鬥埋下了伏筆。

當然，這樣的做法，除了知識份子與黨內某些領導階層的反對之外，毛之所以能夠取得人民的信任，以及地方黨工、各地領導的支持，除了這些地方官的馬屁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毛有效的利用傳媒力量，將偽造的、不實的報導或照片，傳送給各地的人民，讓人民真以為毛的政策成功，更死心踏地的為毛所效力。民眾受到這樣的鼓舞，自然更深信人的能力無限的說法，卻也使得中國的問題與弊病叢生。

而雖然毛在之後也自承個人的失誤，但由於林彪的適時支持，使其免於遭受更多的責難，即使他仍必須暫時的將國政交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處理，不過，他仍伺機復出，在劉少奇等人進行經改的同時，毛也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四清五反」，以防止人民在思想上逐漸偏向資本主義，但由於劉鄧等人力求思想教育不得過多影響經改，以致於毛認為「修正主義」已滲透進黨內，並在之後發動了文革，將中國再一次的進行重整。³⁶其實，毛慣有的群眾魅力，以及他強調民族的積極性、能動性，是他長期以來呼風喚雨的重要工具；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問題時，毛都能夠相應的提出應對之道，更有趣的是，他都能夠將之上升到民族衝突的境界，藉此順利的引發人民的共鳴，使其的作為能夠順利開展。

³⁶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五章、第六章。

也就是說，毛澤東在看待民族能力的問題時，他都以一種較為「正面」的角度去切入與觀察。這種從「光明面」來激發人民能動性的做法，與毛個人的「理想性格」亦脫不了關係。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是以標榜「實踐」而贏得許多拼搏的，但，隱藏在他心中的「理想性格」，卻在後期制約影響著他；這種理想性，代表著其認為「中國」不比西方國家「弱」，或中國的「落後」，卻又是中國的「優勢」，他以中國過去曾經的豐功偉業作為依靠，強調中國人的能力，是不比外國人差甚至是超越之的，藉以推動各項的工作，並以這樣的心態，挑動一般大眾的民族自尊與自信，作為他帶領中國前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世界的重要依據。亦即，這樣的一種強調民族自尊、民族能力的做法，相當程度消去他在施政方面所造成的某些錯誤，除了其他黨內高層可能看到真正的「實情」之外，多數的民眾仍舊擁護毛澤東、遵循他的論述邏輯與政策路線，也使得日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能夠造成全面性的「大改造」，並形成一種嶄新的社會風潮。

第三節 擺脫傳統制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論者認為是毛為了鬥垮黨內的走資派所發動的；亦有論者認為是毛澤東的過分理想性格所造成，其餘關於建設方式的分歧、潛意識的支配問題等等，都是受到討論的焦點。³⁷在此，我們不去討論文革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因為上述的理由，確實都有其可能性，也都多多少少影響了文革的發生，但要注意的是，文革的發生，絕對不是僅有單一個因和果，而是多種原因集合交織之後所產生的。

在文革發生的眾多原因中，黨內階層的互相傾軋是其中之一。很重要的，毛澤東將這樣的互鬥，定位為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並且將所謂的「走資派」視為中共乃至於民族的罪人，這些罪人試圖引進西方的社會模式，取代「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地位，使中國有可能復辟成為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禁鑿。毛將這樣一種大規模的運動，上升到中國/西方的對立，使這項運動成為民

³⁷ 成龍，「一個值得深入反思的歷史客題——國外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研究評析」，*攀登*，第6期（2006），頁139~140。

族爭取自立自救的救生符，有效的受到大規模民眾的呼應，也間接造成社會日後的混亂與不安。

事實上，承接上節，在建政之後至 1965 年這段期間，毛澤東試圖以「點」的方式，找出或改造不適合中共發展或中國前進的「傳統文化」，但在其創造新意的時候，卻難以避免的造成了社會的動盪與混亂，也造成知識份子乃至於黨內其他領導階層意見的不一，相當程度亦影響了毛的見解，也就是他認為必須要由點至面，全面的打破過往的束縛，對社會進行再一次全新的淨化運動，重新對社會進行解構與重構，成為一個全新的「中國」，所以，在文革期間到處都看到傳統文化的名勝古蹟被破壞、至聖先賢被嫌棄，甚至子殺父、親人相殘等逆倫事件層出不窮的結果。

不過，扣除掉文革所造成的一些不好的後果，以及黨內鬥爭的因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澤東追求快速進入共產社會的最後手段，或是一種不得不的方式。當毛澤東試圖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並實施一系列充滿理想的政策作為，卻招致其他黨內領導人不同的意見與現實的挫敗之後，他非但沒有停下腳步，重返以「實際」狀況為考量的穩健腳步，反而更加深他打破過去，創造全新中國的意念。這一切看似充滿著個人的脫序思考，但事實上卻充滿著理性的算計與選擇。

從民族主義與再生產的角度來看，文革期間的中共官方，試圖從鼓動最基層的民眾做起，從全國範圍內進行炫風式的改革，這樣的作法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的思想隱含在其中。中共通過民族主義論述的建構，亦即包括中國人的優勢、要超越蘇聯成為共產國家龍頭等觀念，要創造一個完完全全全新的中國文化，藉此鼓動人民的積極性，掃除國內不應該存在的壞因子，讓中國能夠真正的進入另一個新的境界，加以中國確實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四年成功試爆原子彈，使中

國成為與美國、蘇聯並駕齊驅的世界大國，更加深了人民心中的民族自信與意識，這樣一來，也加強了人民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支持與信心。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的擁護者，在排斥外來文化的同時，都會盡全力的保護本身所擁有的「傳統文化」以及自主性。不過，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作為先鋒部隊的紅衛兵卻是全盤的將代表的寺廟、建物破壞殆盡，僅存少數的歷史遺跡殘存；同時，也將倫理道德等貫穿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給撕裂。但是，很奇妙的地方在於，在這樣國內陷入瘋狂的情況底下，毛澤東與中共當時的領導階層卻仍有餘力將眼光放至國外，包括美國黑人民權事件、以金錢與實際行動支持他國革命活動等等。這種充滿世界主義的情懷，與排外的民族主義看似有扞格，但總歸來說，卻又不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制約。³⁸而事實上，這樣的世界主義或反帝國主義情懷，一直存在在毛澤東的思想之中，而在文革展開前，這樣的想法就逐漸產生各種跡象，毛澤東嘗言：

「目前巴拿馬人民正在英勇地進行的反對美國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的鬥爭，是偉大的愛國鬥爭。中國人民堅決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邊，完全支持他們反對美國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運河區主權的正義行動。…美帝國主義到處橫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為敵的地位，使它自己越來越限於孤立…全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一定會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³⁹

「…最近，日本全國掀起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反對美國 F-105D 型核飛機和核潛艇進駐日本，要求撤換一切美國軍事基地和撤走美國武裝部隊，要求歸還日本的領土沖繩，要求

³⁸ 劉青峰，「文化革命中的華夏中心主義」，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 359~360。

³⁹ 毛澤東，「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354~355。

廢除日美安全條約等等。所有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體人民的意志和願望。中國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義鬥爭。…」⁴⁰

毛澤東支持其他地區對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行為，也是其試圖爭取落後地區或國家能夠有效的連結之手法；而中國在文革期間的自我孤立與世界主義兩者兼備的矛盾，從民族主義角度來看，很重要的，中共或毛澤東體現了中國再度作為世界中心位置的重要性。這是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從屈居於蘇聯的地位一躍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並且取代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中共在文革期間，甚至出資贊助尼泊爾、南美等國的共產黨運動，在當時的毛派份子之中蔚為一時風潮。

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浪潮，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主義最狂熱的時期。當時被鼓動的人民非常自信，認為「今天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統帥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後勝利衝去了，資產階級要徹底完蛋了！」、「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這些相關論述在文革中層迭出現，相當正常；也很明顯的看出，毛澤東利用這種民族主義式的論述鋪陳，試圖將整個運動更加的合理與合法化；也可以這樣解讀，這種民族主義的論述，將民眾的注目焦點從國內拉至國外，甚至讓人民覺得中國再度成為世界的中心，相當程度降低了在中共內部發生的權力傾軋活動所產生的影響。

另外，中國要充當第三世界的領袖，並且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中扮演第三個超級大國的角色。這些都是旨在確定國際社會承認中國是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大國，文化大革命時的 1969 年珍寶島事件，毛澤東在國民經濟極為困難時期，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與原本的兄弟蘇聯進行軍事對抗，這種做法滿足了中國人民

⁴⁰ 毛澤東，「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日本人民偉大的愛國鬥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 361~363。

族主義心理膨脹需求。在此，筆者認為可以幾句話概述這種民族主義所帶來的效果→凡是中國對外發生戰爭時，共產黨政權就得到人民的支持，凡是對共產黨統治制度的支持，就是對領袖的支持，這是另類的「兩個凡是」。民族主義成了中共處理統治問題與發展問題最佳的配方。

其實，就如前述，看似矛盾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在文革中之所以能夠並行不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傳統的「中國中心」思維，或「華夏中心主義」的作祟。⁴¹但是，傳統的華夏中心主義，是以中國長久以來的制度文化為憑藉，以此作為中國「驕傲」的理由；反觀文革時期的華夏中心主義，則相當程度拋棄了中國「傳統」，或將之隱而不談，而是以完全的「毛澤東思想」作為代替，「毛澤東思想」成為與「中國傳統文化」平起平坐、甚至是超越它們地位的論述邏輯。這段期間內，毛澤東不論是有意或無意的鼓動人民大眾，基本上「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本人已經成為如神般的象徵，也成為新的「華夏中心主義」的中心思想；也可以這麼說，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已經拋棄了他所宣稱的掃除封建文化的遺毒，⁴²自己成為「舊封建文化」新的代表人，因為他也變成了一個「教條的中心」、一個高高在上，萬人膜拜的「偶像」。

這種「新華夏中心主義」的產生，也可說正如同前述所言，是一種「新傳統」的製造與流傳，它取代的是存在於中國歷朝歷代許久的「舊傳統」，或是被毛澤東及當權者所規定的「舊傳統」；這是民族國家經由學校、傳媒等力量所再生產出的一套文化，不同時期中，會生產出內容不同的文化；不過，這種文化再生產的推力與動力，相當程度的、或幾乎百分之百的，都是透過民族國家領導階層所控制與推行，平民大眾多只是接受者或是行使命令者，基本上沒有太多置喙的空間。

⁴¹ 劉青峰，「文化革命中的華夏中心主義」，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頁 360。

⁴² 廖蓋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 94-95。

也可以這麼說，「新文化」的作用與「舊文化」類似，都成為一種「普遍主義」，⁴³甚或是變成毛澤東在與國際派鬥爭時批評最力的「教條主義」的一個衍生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並未阻止紅衛兵或其他政府單位對其思想所進行的「加冕」活動，亦即，毛澤東很弔詭的對其秉持的「實踐」原則有了不同的解釋與定義，但，也可這麼說，他依舊相當「實際的」將其認為最適合當代的理論付諸實踐，這是他理性選擇下所做出之合時宜的權宜之計。

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認為，那就是毛澤東在其統治期間，與其老大哥蘇聯的摩擦日益加劇，蘇聯的那套生產模式與意識形態，也因此被毛澤東所否定，甚至認為蘇聯的馬列主義模式是失敗的；從中，他看到了所謂「馬列主義」的困境與窒礙，因此，由他「個人」所領導的、所發展而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就是時候取馬列、取中國傳統而代之，甚至因此可以起到鼓舞人民的作用，使人民依舊臣服於他的手掌之中。

論述至此，我們可以發現，民族主義策略的鼓動或其應用模式，在文革期間對於毛澤東追尋心目中理想的中國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不論是對內的統治，或是與其他共產國家兄弟之間的打交道過程，民族主義的浪潮讓毛澤東與當時的掌權者獲益匪淺。當然，文革最終證明結果是不好的，劣大於優；但是，不可否認的，毛澤東將中國傳統文化適時的隱藏或毀滅之，全面性的、創新的製造出新的「文化」或稱之為「新華夏中心主義」等論述與概念，有效的從民族認同、民族的大利出發，將民族主義式的論述與政策，作為其往社會主義天堂或共產主義未來邁進的載體。

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夠單單的將民族主義的建構視為是只有單一個原因造

⁴³ 金觀濤，「創造與破壞的動力：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與演變」，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頁 139。

成，或僅只是統治者的工具；有時候，統治者可能只是起到一個帶頭的作用，相當程度的結果，則是萬千民眾所親身力為的；如果人民大眾不信任這位統治者，則一人之力，能否抵禦得了上億的中國人民，相信是非常困難之事。亦即，毛澤東過人之處，就在於他總能夠適時的建構出一套區別出我/他的論述、一套中國/資本主義國家相扞格的論述，以此挑動人民的身心與思想，終使其總能夠徹底的動員民眾，絕大多數的人民也為了貫徹「毛主席的思想」、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而積極的在各種政策與運動中賣力前進。

亦即，這樣一種由上位統治者與底層人民積極互動的形式，兩者相互的影響與制約，民族主義有效的成為一種中介點、一種載體，統治階層將民族主義情緒挑起，底層民眾適時的接納民族主義的論述，兩相配合之下，使毛澤東與中共時任領導階層能夠盡其所欲，逐步將中國帶往其理想的國度前進。

第四節 小結

綜合以上簡單的討論，我們可以從毛澤東時期一系列民族主義論述中，找到毛澤東治理國家的方法與邏輯。基本上，不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是建政後一系列政策產出與運動的推行，乃至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毛澤東在面臨政權發生危機或是中國道路愈往其所設想之反方向走時，他總能夠適時的塑造新的「民意」，鼓動最底層但也是最廣大的中國人民，從民族主義的概念出發培養人民的「認同感」，了解自身是身為一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一員，甚至是很榮幸處在「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個體。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在於其能夠透過學校教育與「兩報一刊」的廣播，具備了瞻前顧後、顧及現況同時也能設想未來的雙重功效。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在延安設立了馬列學院、中央黨校等教育機構，以及鼓勵幹部閱讀「聯共黨

史」、秘密編纂「六大以來」等與國際派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手法，⁴⁴到之後的整風運動，實際上就是一種藉由教育轉化人意志的手法，透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涵，以最貼近人民的概念宣揚馬克思、同時宣傳毛澤東思想，無形之中使得毛的論述與意志進入到一般大眾的生活思想之內，對於奠定其日後的成就有很大的影響。

再者，建政後毛更陸續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意識形態概念普及到各級學校之中，使人民在接受教育的同時，也變成馬列毛的「同志」或「傳人」，這種手法讓教育成為一種讓文化專斷可不斷被再生產的手法，也讓毛的權力基礎更加的穩固。⁴⁵但是毛並不只是死板的將一些經典、教條灌入學校、媒體之中，他同時也在試圖建造屬於中國的一套新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這是一套動態的兼顧「創新」與「複製」的過程，但反過來看，這樣的過程也呈現出另一種結果。

基本上，毛時期雖然試圖創造出一套新的「文化」，也真的創造出一套不同於傳統文化的邏輯思想，並且透過教育的手法，將這些「新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思維傳授給學生，但是，毛這一系列動態過程，似乎隨著其統治愈形穩固，越看不見這樣的運作。首先，毛在與國際派的鬥爭過程中，宣示的是打擊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在他鋪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述的過程中，也強調不能照搬馬列主義，必須將之與中國「實際」結合，才是有利於中國發展的明確之道。但，當他從與國際派的鬥爭中獲勝之後，在中共全會上就毫不避諱的接受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並將之寫入黨章之中，很明顯的，這就犯了他所不想要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之錯。

⁴⁴ 可參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第五章。

⁴⁵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著，邢克超譯，*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8。

其次，建政之後雖然對知識份子仍給予一定程度的空間評論時政，但這種空間也隨著時間而更形壓縮。到了反右爆發，知識份子根本就沒有辦法、也沒有餘力去批評中共，給中共任何建言，因為有風骨的知識份子不是被殺，就是被下放、被監禁，沒有「人身自由」。從這兩點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毛地位的愈趨穩固，文化創造的動態性似乎也漸漸的「穩固」，甚至可說是「停滯」。到了文革爆發，毛澤東思想的愈趨「神化」，民族整體的能動性被壓制的難以動彈，人民的行為都得遵從「毛主席的指示」，或遵循毛主席的一小撮領導階層的指示，毛澤東思想佔據了整個中國，也阻斷了文化動態發展的可能性。另外，原本民族主義之中強調的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在毛統治後期愈發被階級、人民、社會主義所代替。⁴⁶這不是說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議題就從此消失，相反的，它仍然保留著國家主權被侵犯或被外者影響的疑慮，而這一點，也是毛統治後期影響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發展。⁴⁷

另外，毛澤東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述，雖然試圖從中國出發來找尋最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但其中有個部分，透過上述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問題存在，那就是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上還是一種以西方中心為立場的論述。雖然他宣稱要從中國實際、中國現況出發，配合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來進行改革，不過，他所呈現出來的，仍然時時刻刻都宣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底下所繼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亦即，他仍然受到「馬克思列寧」甚至是斯大林的影響，還是受限於這樣一種來自西方的論述之制約，依舊不能夠完全的跳脫出西方的影響，完全的從中國立場來看待中國的問題。

同時，毛澤東所高舉的民族主義旗幟，已非過往中國傳統那樣把「傳統文化」

⁴⁶ 王曉明，*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頁 218。

⁴⁷ 王曉明提出一個例證，他將 1960 年代之後中蘇間的論爭看成是「社會主義」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這是中國所持有的「社會主義」理念起到了一種合法性、正當性的作用，同時也是中國民族主義不希望被蘇聯影響制約所發展出的一套新論述。詳見王曉明，前揭書，頁 219。

或「中國文化」置於最前頭，而是一種以種族與國家民族主義為主要前提的做法，雖然毛將文化定義為民族的、科學的與大眾的，⁴⁸但不論是新的或舊文化，在這個時期中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工具性質。毛時期透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以及在學校教育、大眾傳媒的努力下所大量傳播的「毛澤東思想」，試圖以這樣一種論述，獲取跨種族的認同，使得生存在中國內部的各不同種族，藉由對毛思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進一步對中國共產黨產生認同的意念，並透過這樣一種類似於文化同化的手法，使其無論在施政、或面對其他問題時，都有較為便利的解決手段。

綜合以上，筆者認為，在毛澤東掌權的數十年間，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政之後的各項政策與論述，到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中共的民族主義論述始終包含著文化、種族以及國家民族主義等民族主義模式在其中。基本上，毛澤東在不同時期中，會從不同的立場出發，試圖獲得成功。我們可以看到，在與國際派鬥爭的時期，毛澤東從文化立場出發，創造一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論述，從最貼近人心、最靠近人普通生活的立場，接近人民、獲得人民與其他黨員的支持；相反的，在建政之後，他從國家的立場出發，試圖斬斷資本主義世界的影響，甚至最後也企圖將蘇聯的影響消之殆盡，最終更強力塑造「毛澤東思想」的神聖性，並發行其個人的相關著作至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企圖將中國建構成世界革命的中心，以這樣的宣示，再度獲取人民大眾的認同，也間接造成最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與慘痛經驗。

因此，事實上，貫穿毛澤東統治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概念，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意涵；它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動態的創造過程。只是，毛澤東在晚期，一定程度上有意或無意的忽略掉這種建構的動態性，將「毛澤東思想」當成中華文化最新的產物，或「傳統」的替代品，即使他反對其他領

⁴⁸ 羅洛主編，*毛澤東思想研究大系—文化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 81~85。

導階層這樣一種神化運動，但這樣的形象塑造，卻也確確實實的刻畫入人民大眾的心中，成為一項無法抹滅的圖騰。毛成功的將自己與人民的生活密切的結合在一起，他也成為「中華民族」新一代的救星、標的。

另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基本上與民族主義之間是有相當程度的扞格存在的，⁴⁹不過，毛澤東長期以來卻持續關注民族乃至於群眾的力量，以民主集中制的確保來保證黨群間的關係，在毛澤東的想法之中，這也是一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展現，亦即，馬克思主義不論是經過蘇聯或是中國甚至是其他地區，都必須要能夠有「彈性」存在，以適合當地發展的方法做為依歸與最主要的憑據。

從以上的種種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毛運用民族主義的策略、手法與時機，是相當切中要害，並且幾乎招招有效的動作；他藉此創造出屬於中華民族的「新傳統」或「新文化」，相當程度點出「民族的」「新文化」之形象，並將這樣新近建構出的論述策略，積極的透過教育、傳媒等媒介，傳送予人民大眾、黨的各項公職。當然，他絕對不是就完全棄西洋於不顧，或真的只著重在中國內部的各項建構，他依舊強調要互相學習，只是更加放大「民族」的重要性。⁵⁰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就毛的觀點來看，毛統治後期，最終之所以爆發文革，實是綜合了黨內鬥爭、毛的理想性格與重建民族自信心等各項因素交雜而成，是「中華民族」不得不面對的時代問題。

⁴⁹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Traged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⁵⁰ 榮開明，曾成貴等著，*毛澤東治國方略*(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頁 193。